

给农民评职称，是“福利”还是“折腾”？

文明棱镜

看见问题的每一面

编者按>>>>

近日,《辽宁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办法(试行)(征求意见稿)》发布,提出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,设置初级、中级、副高级和正高级四个级别,引发热议。有人认为此举有利于打破刻板印象,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人士转型;也有人认为,给农民评职称,本质上是把适用于科研院所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模式照搬套用于农民群体,必要性存疑。

给农民评职称,不是新鲜事,河南、山东等省份此前也曾发布过有关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文件。给农民评职称,到底该不该评?又该怎么评?《文明棱镜》对此予以探讨。

甲方 评职称可让更多“新农人”脱颖而出

◎ 汪昌莲

近年来,一些地方探索为新型职业农民评定职称,让“新农人”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获得官方认证,这不仅是对农民职业身份的尊重与肯定,更是一场深层次的人才制度创新,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。给“新农人”评职称,评的不只是技术,更是对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坚定选择,是对“谁来兴村”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。

长期以来,农民被视为一种身份,而非职业。在传统观念中,“跳出农门”是无数农村家庭的期盼,农村人才“走出去”易,“引回来”难。而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推行,正在打破这一认知壁垒。个别省份早已开展试点,将职称评审现场搬到田间地头、果蔬大棚,以实践能力、产业规模、带动效益作为主要评价标准,真正实现职称评定不唯学历、不唯论文、不唯身份。这种评价体系的革新,让种地成为有尊严、有前景的职业,极大提升了农民群体的职业尊严与社会认同感,激发出职业自豪感与发展内生动力。

获得职称的“新农人”,往往具备技术专长和产业基础,他们懂农业、善经营,是乡村产业振兴的“领头雁”。一些地方还配套推出政策倾斜,或给予现金奖励,或在项目申报、贷款申请等方面优先支持。这些激励机制,让职称不只是一纸证书,而是创业兴业的“通行证”和“助推器”,有效激发了人才扎根乡村、服务“三农”的热情。

更重要的是,评定职称成为乡村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开辟了新路径。当前,人才短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突出瓶颈。通过职称评定,政府释放出“农村需要人才、农村成就人才”的强烈信号,它能吸引更多懂技术、有情怀的农民返乡创业,让走出去的大学生看到回农村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,也会吸引外地高学历人才“下沉”农村,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。由此来说,获得职称的“新农人”相当于吸引人才的“种子”,有助于农村形成“以才引才、以才育才”的良性循环。

给“新农人”评职称,评出的是希望,激发的是活力,发展的是乡村。当越来越多“懂技术、会经营、爱农村”的新型职业农民在田野上崭露头角,乡村全面振兴的画卷必将更加壮阔。这不仅是人

才评价的革新,更是新时代“重农强农”的生动实践。这一制度应在广袤田野上持续“开花结果”,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。

“警察叔叔,我们要评评理。”近日,浙江丽水七名小学生玩耍时因小事发生争执,谁也不服谁,最终前去派出所评理。丽水市松阳县公安局象溪派出所民警将他们请进调解室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孩子们表达感受,倾听对方的声音,最终双方握手言和。不少网友点赞警察“尊重孩子,很有耐心”,更点赞小朋友们“情绪稳定,有矛盾知道找专人解决,而不是吵闹打架”。

小学生吵架进派出所评理,是一次生动深刻的“法治实践课”。由于认知有限、容易冲动,

在很多人的认知中,职称评定是科研院所、事业单位的事情,面向的是知识分子、技术人员等群体,将这种评定模式照搬套用于农民群体,并没有多大的必要性。

从职称本身来说,职称针对的是新型职业农民,也就是在农业农村一线的现代农业从业者,他们具有一定种植、养殖、农村社会服务等农业技术技能,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经济来源,能够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。但是,我国早已建立了农业技术员、助理农艺师、农艺师、高级农艺师等职业资格认证体系,不必另起炉灶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职称评定背后潜藏的行政干预,可能将原本自由灵活的农业生产经营引入形式主义的窠臼。职称评定往往伴随着材料申报、论文发表等形式化要求,这无异于给农民戴上无形的枷锁,加重农民的负担,很可能影响生产进度与生产效率。中老年农民文字表达能力十

分有限,即使具有农业技术技能,也普遍面临着数字化鸿沟,难以应付复杂的职称评定事项。给农民评职称如果“重学历、拼论文、看材料”,可能将扎根田间、身怀绝技的“新农人”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拒之门外。

从公平正义角度说,评上职称的农民可以获得一些优待,比如基层服务组织在农村招聘相关人员时,同等条件下可享优先受聘;优先签订有偿技术承包、指导、培训和推广合同;优先享受新技术培训;优先承接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模式的试验示范等。一旦职称评定与资源分配等挂钩,可能催生新的不公。比如,一些人将职称评定视为获取项目补贴、土地倾斜或政策照顾的捷径,弄虚作假、投机取巧,在材料包装和关系运作上下功夫。一些掌握着资源分配话语权的基层干部,也可能借机谋取私利,使职称评定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,将真正默默耕耘却不

知不

给农民评职称,争议的核心并非“该不该评”,而是“该评什么”,后者才是本质问题。唯有明确评定的核心导向与具体维度,才能让这项制度真正贴合农民群体的实际需求,避免陷入形式化争议。

杜绝“论文崇拜”,回归农业生产本质。职称评定长期与论文、学历等指标绑定,这一适用于科研院所、事业单位的评价逻辑,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核心属性相悖。农业生产的价值内核在于实践与实绩,农民的专业能力体现在对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把握、种植养殖技术的优化、产业运营能力的提升上,而非书面理论的堆砌。若将论文作为农民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尺,不仅会让多数深耕田间的实干农民被挡在门外,更会引导部分农民脱离生产实践去追逐虚无的职称指标,违背职称评定的初衷。因此,农民职称评定必须打破“论文至上”的惯性思维,将实干实绩作为核心标尺,让评定标准真正与农民的实践能力与生产贡献挂钩。

乙方 别让职称评定成为农民的“无形枷锁”

◎ 刘剑飞

中报技巧的农民排除在外。

更何況,因为评价标准难以统一,农民评职称面临着可行性挑战。农业生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实践活动,其成效主要体现于农产品产量、质量以及市场效益等多个维度,而这些成效的取得,很容易受到气候、土壤、市场行情等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,忽视这些因素,用一套固定的标准去评价农业生产实践,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。

农民作为传统职业群体,其职业尊严本不应由一纸职称来定义。农民的价值体现在对土地的坚守、对丰收的贡献中,真正的职业认同应来自社会尊重、公平回报,而非职称头衔。与其通过评职称给农民以激励,不如下大力气在惠农上下功夫。完善农业基础设施,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,健全农业风险保障体系,切实降低生产成本,帮助农民抵御市场波动的冲击,这才是务实之举。

丙方 评定标准要贴合实际需求

◎ 董宏达

杜绝形式主义,保障获评职称的农民切实发挥作用。职称评定不是终点,而是激发农民积极性、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起点。若仅将职称评定视为一种荣誉授予,缺乏对获评者后续作用发挥的制度设计,职称评定便会沦为空洞的形式。这就要求在设定评定标准时,必须将“能力适配性”与“作用发挥空间”纳入考量,评定内容不仅要考察农民现有的技术水平,还需要兼顾其带动产业发展、传承农业技术的潜力,通过明确的标准导向,让获评者清楚自身的责任与价值,避免出现“评完即结束”的现象,确保职称评定能真正转化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实际动力。

杜绝人情评定,防范权力寻租。给农民评职称若失去公平性,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,损害制度的公信力。人情关系、权力干预等因素极易渗透到评定过程中,导致评定标准形同虚设,真正有能力的农民无法获评,而不符合条件者却能凭借非正当途径过关。因此,相关制度设计必须将评定流程、评价

维度、打分依据等全部公开透明,摒弃模糊不清的主观评价条款,建立多维度的监督机制,通过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压缩权力寻租空间,确保每个获评者都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。

杜绝教条评定,精准匹配产业需求,避免职称评定与实践脱节。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,有的以粮食种植为主,有的侧重经济作物栽培,有的则聚焦畜禽养殖或农产品加工。农民职称评定必须立足区域产业特色,与当地主导产业紧密结合。评定内容应围绕区域农业的核心技术、产业升级方向设定,让评定标准成为引导农民对接产业需求、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风向标,确保职称评定能够真正服务于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。

给农民评职称,从一些地方的探索,到辽宁此次引发的热议,都说明给农民评职称,不在于其形式是否新颖,而在于其是否真正贴合实际需求,能否解决实际问题。

这场由一群陌生人出面完成的告别,如同一面镜子,既映照出网友们发自内心的真挚善意,也折射出社会结构变迁下,我们正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与守望相助的新可能。

从浙江远道而来的游客、凌晨三点未眠只为准时赴约的本地上班族……他们本与这位老人及其家人的人生轨迹毫无交集,是什么驱使他们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的葬礼而奔波?答案可能藏在那句“但凡博主有一点招,也不会大半夜在网上找人,应该是真没招了”的朴素共情里。也让我们看到,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那份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纯粹善意,成为照亮寒冬的一束光。

葬礼求助者坦言“朋友不多,而且都不在哈尔滨”,在不经意间揭示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现象: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为社会中坚,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、核心化,传统的亲缘、地缘支持网络正在悄然稀释。可以预见,在未来社会中,养老、照护、临终关怀等类似的场景可能会越来越常见。哈尔滨这场葬礼,恰如一个预演,提醒我们应该如何适应、应对这一变化。

在这次葬礼中,网友的自发集结,意义远不只是完成一场仪式。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同理心的“社会性抱团取暖”,是陌生人之间为抵御孤独、无助等现代社会常见困境而自发形成的短暂却有力的情感共同体。这种依托现代网络平台、基于共同价值认同而迅速建立的临时性互助,展现出一种充满韧性的社会联结新形态。它证明,即便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,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本能并未消失,而是以新的方式被激活和传递。那些主动伸出的援手,不仅温暖了当事人,也治愈和鼓舞了所有见证者,为社会注入了宝贵的信任资本,让社会充满道德温度。

当成年人能认真对待儿童世界中的“小冲突”,并以智慧与尊重引导孩子们解决问题时,他们才可能成长为睿智处理“大分歧”的公民。

警惕“AI魔改” 割断文化脐带

◎ 吴霞

据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”微信公众号消息,为整治“AI魔改”视频传播乱象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6年1月1日起,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,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、历史题材、革命题材、英模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“AI魔改”的问题视频。

当AI的“剪刀手”伸向经典影视,当孙悟空的金箍棒变成搔首弄姿的道具,当岳飞被塞进荒诞的职场剧本,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技术对内容的篡改,更是文化基因面临的断裂危机。国家广电总局的专项治理,恰似给狂奔的“技术野马”套上缰绳,并提醒“魔改”者:文化不是任人打扮的玩偶,技术不能成为亵渎文明的凶器。

“魔改”视频的本质,是资本与技术合谋下的文化污染。某些账号深谙“黑红也是红”的流量密码,将四大名著、革命历史等文化符号拆解为零散的娱乐碎片,用AI的快速生成能力批量生产“文化垃圾”。这种创作消解了经典的严肃性——当《西游记》只剩“妖怪谈恋爱”,当雷锋故事变成“职场厚黑学”,文化传承的根基正在被腐蚀,文化脐带正在被撕裂。青少年在算法“投喂”中接触了“魔改”视频,文化认知的免疫系统会面临崩溃风险。

AI作为工具本无善恶,当它被资本驱动用于收割流量时,便沦为文化虚无主义的帮凶。某些平台明知内容低俗仍“睁只眼闭只眼”,只因“魔改”视频的播放量能变成真金白银。这种“唯流量论”的创作伦理,比技术失控更具破坏性——它摧毁的是社会对文化价值的敬畏之心。

国家广电总局的治理行动展现了监管决心。但治理只是治标,治本还需构建“创新有界”的创作生态:平台需升级AI审核机制,将文化价值评估纳入算法模型;创作者应重拾对经典的敬畏,明白真正的创新是在尊重文化内核基础上的表达延伸;教育体系则需加强媒介素养培育,赋予青少年辨别文化真伪的能力。技术狂飙的时代更需要“文化定盘星”。守护经典不是拒绝变革,而是防止文化基因在商业逻辑中被恶意编辑。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一旦变异,重建的成本远超想象。这或许正是本次治理留给时代的最深启示。

陌生人冒雪赴约 一场葬礼背后的温暖陪伴

◎ 苑广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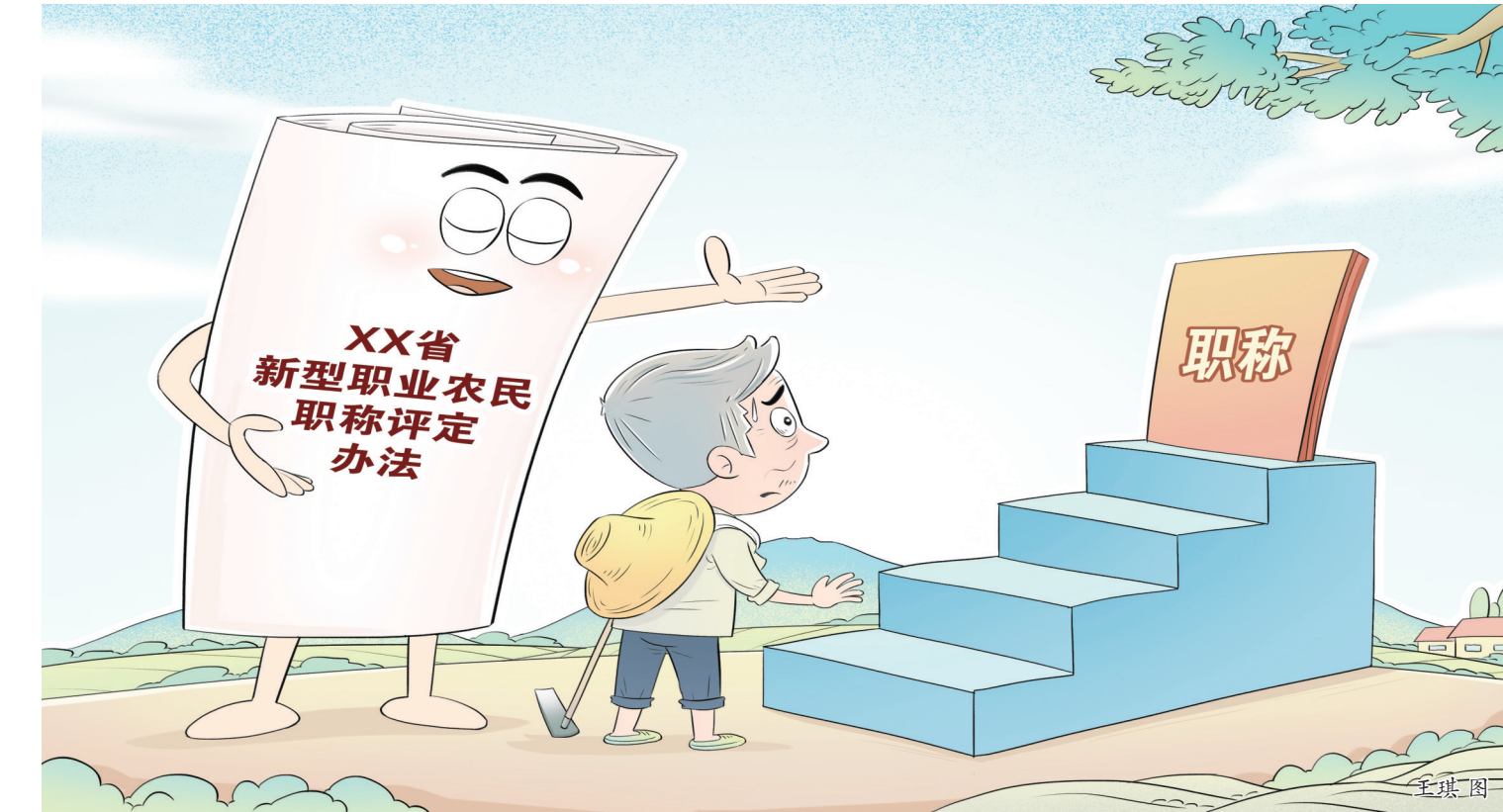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,在黑龙江哈尔滨,社交平台上的一封求助信引发网友关注。一名网友称,自己90岁的奶奶“喜丧”,但她朋友不多,而且都不在哈尔滨,她不想让奶奶走得孤单,求助网友能来送奶奶最后一程。求助信引来数千名网友声援,有不少网友踊跃报名,不能来的网友也积极支招。2025年12月23日,葬礼如期举行,发起人更新后续信息,称葬礼圆满结束,她对能冒着大雪前来吊唁奶奶的网友表达了感谢和祝福。

这场由一群陌生人出面完成的告别,如同一面镜子,既映照出网友们发自内心的真挚善意,也折射出社会结构变迁下,我们正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与守望相助的新可能。

从浙江远道而来的游客、凌晨三点未眠只为准时赴约的本地上班族……他们本与这位老人及其家人的人生轨迹毫无交集,是什么驱使他们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的葬礼而奔波?答案可能藏在那句“但凡博主有一点招,也不会大半夜在网上找人,应该是真没招了”的朴素共情里。也让我们看到,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那份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纯粹善意,成为照亮寒冬的一束光。

葬礼求助者坦言“朋友不多,而且都不在哈尔滨”,在不经意间揭示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现象: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为社会中坚,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、核心化,传统的亲缘、地缘支持网络正在悄然稀释。可以预见,在未来社会中,养老、照护、临终关怀等类似的场景可能会越来越常见。哈尔滨这场葬礼,恰如一个预演,提醒我们应该如何适应、应对这一变化。

在这次葬礼中,网友的自发集结,意义远不只是完成一场仪式。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同理心的“社会性抱团取暖”,是陌生人之间为抵御孤独、无助等现代社会常见困境而自发形成的短暂却有力的情感共同体。这种依托现代网络平台、基于共同价值认同而迅速建立的临时性互助,展现出一种充满韧性的社会联结新形态。它证明,即便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,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本能并未消失,而是以新的方式被激活和传递。那些主动伸出的援手,不仅温暖了当事人,也治愈和鼓舞了所有见证者,为社会注入了宝贵的信任资本,让社会充满道德温度。



小学生吵架进派出所评理,一堂生动的法治实践课

◎ 宋雨霜

小学生面对冲突时往往本能地采取争吵、推搡等“私力救济”方式。而这七名小学生面对“谁也不服谁”的争执,选择走进派出所求助,这是一次重要的认知和行为转变,孩子们意识到社会上存在中立的第三方机构,可以通过规则和程序来公正解决纠纷。

民警将孩子们请进调解室,让“公力救济”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。更让人感到暖心的是,民警让孩子们对向入座、平等对话,潜移默化地凸显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内核,孩子们在对向

坐、派代表有序发言、握手言和等程序性动作中,感受到平等原则、中立原则、参与原则的内涵。这个过程性体验,比法治课本上的知识来得更生动和直接。可以说,民警的调解引导让孩子们完成一次“微型社会契约”的订立,即双方在互相尊重、停止攻击、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重建关系。

有网友认为,“这几个孩子解决纠纷的方式值得推广”,这折射出当下青少年法治教育有短板。传统的法治和规则教育更多是基于书面和

